

我国双减政策工具选择与组合逻辑研究——基于2018-2025年政策的文本分析

董宁宁

(中南民族大学, 武汉 湖北 430000)

摘要:我国于2018年至2025年间发布了一系列围绕“双减”主题的教育政策文本,本文以其中典型政策文本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在规范梳理了条文内容的基础上,重点解构了核心政策工具的类型谱系,并进一步考察了不同工具间的协同机制及其对构建可执行政策体系的具体作用。研究显示,单一政策工具在实际执行中存在明显的效能边界,往往难以独立支撑改革目标的实现,“双减”政策的真正落地,本质上依赖于多种工具的合作协同,各类工具并非孤立运作,而是遵循特定的组合逻辑相互耦合,共同构成了严密的政策执行系统。鉴于此,本文并未止步于对政策工具选择偏好的表层描述,而是试图深入剖析其背后的组合规则,旨在透过这一视角,来揭示国家在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潜藏于政策文本背后的深层治理逻辑与宏观战略意图。

关键词: 双减政策; 政策工具; 组合逻辑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47

A Study on the Selection and Combination Logic of Policy Instruments for China'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 Textual Analysis Based on Policies from 2018 to 2025

DongNingN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Between 2018 and 2025, China issued a series of educational policy documents centred on the “Double Reduction” initiative. Using representative texts as samples and text analysis, this study deconstructs core policy instruments typological spectrum, examines their synergy mechanisms and roles in building an implementable policy framework. Findings show single instruments have effectiveness limitations and cannot independently achieve reform goals. The policy's implementation relies on multiple instruments synergy, which are interlinked by specific combinatorial logic to form a rigorous implementation system.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underlying rules of instrument combination, aiming to reveal the deep-seated governance logic and macro-strategic intentions in n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policy instruments; combination logic

作者简介: 董宁宁(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

通讯作者: 董宁宁

一、研究背景

我国是教育政策生产的大国，教育如何运行、创新和发展基本是依靠政府颁布的政策驱动、控制和调节。借由政策工具杠杆来推动教育改革，已成为当下中国政府治理教育的鲜明标识。步入新时代，立德树人被确立为根本任务，高质量发展成为核心导向，然而，义务教育阶段长期存在的“双重负担”顽疾，不仅掣肘了学生的全面成长，更异化为加剧家庭焦虑的社会痛点，成为亟待破解的结构性难题。我国自2018年起便开始了减负政策的试探性探索，直至2021年《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重磅出台，才真正标志着“双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系统性工程。政策执行中政策工具作为目标落地的载体，其选型是否科学、组合是否适配，更是决定政策效能的关键变量，但在当前现有学界成果里，关于“双减”的研究多滞留于实施现状描摹、问题对策罗列或效果评估层面。相比之下，对于政策工具选择背后的深层逻辑、组合特征的动态演化及其内在机理的系统性解构，尚显薄弱，甚至存在明显的研究盲区。鉴于此，本研究将视线聚焦于2018-2025年间我国“双减”相关政策文本，试图跳出单一工具描述，转而深入探究政策工具的选择偏好与组合逻辑，研究严格遵循“构建编码体系—标准化编码与信度检验—数据统计与深度阐释”的科学范式，保障在方法论上夯实结论的可靠性，填补研究缺口，透过政策工具的微观视角，透视国家在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意图，从而为优化“双减”政策配置、提升治理效能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参照。

二、问题提出

（一）为什么实行双减政策

“双减”政策是我国针对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生态失衡问题推出的战略性公共教育治理政策，其全称为《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21年7月正式印发，后续通过多部门配套政策文件的持续补充与完善，形成了覆盖政策制定、执行、监管与评估的完整实施体系，是调整教育领域的社会问题和利益关系的公共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政策是专门为减轻学生负担而制定的教育政策，目的在于减轻学生的过重负担。而如今“双减”的政策属

性已发生质的跃迁，不再局限于单一维度的“减法”操作，而是以“减负”为破局点，同步驱动教育质量提升与生态系统优化的双向变革。这一改革将2021至2025年锁定为政策密集攻坚与深化的关键窗口期，其核心意图在于通过精准施策，强力纠偏长期困扰义务教育的“内卷化”困境，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呼应国家长远的人才培养战略需求。

（二）政府政策工具为什么要组合搭配

任何一项政策都是目标与工具的有机统一，工具是达成目标的基本途径。政策科学的创始人哈罗德拉斯韦尔(H.D.Lasswell)曾言，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基于对2018至2025年间“双减”政策文本的编码，研究发现单一政策工具在治理实践中常陷入“独立工作”的困境，或因效能边界受限，或因路径依赖僵化，难以独自承载教育减负这一复杂系统工程的重担。对此，政府倾向于采取组合策略，试图通过多元工具的耦合联动激发政策合力。所谓“组合逻辑”，实则是对这种搭配机制的深度解构，究竟是通过功能互补来填补单一工具的结构短板，还是通过层级递进来达到“长效治理”的梯度化路径。这一逻辑背后反映出的是政府在“短期见效”的政治压力与“持续优化”的长远愿景之间进行的微妙权衡。换言之，探究“双减”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本质上是在审视政府如何在教育治理的复杂场域中，动态平衡“快速破局”的紧迫性与“长期引导”的战略定力。这也正是本研究试图切入的关键视角，旨在为厘清“双减”政策的深层治理逻辑与实施成效提供新的解释框架。

三、研究方法 with 工具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借助SPSS 27.0软件开展多维度数据统计分析。

1.描述性统计

使用SPSS 27.0进行分析各编码维度的频率与占比，进而把握“双减”政策编码的整体分布特征。

2.内容分析法

本研究以2018-2025年“双减”政策文本为基石，搭建多维编码体系，通过严格的标准化编码与信度检验，完成从文本到数据的量化转译。

研究以融合量化透视与质性深描的双重视角展开,并对数据的深层交互进行解读,旨在剥离政策话语的

表层伪装,提炼其内在的治理逻辑与演化轨迹,最终为理解“双减”政策的复杂生态提供强有力的实证支撑。

3.基于 NVivo12 的单人编码及重测信度分析方法

针对开放式问卷所获的非结构化文本,本研究依托 NVivo12 平台构建了系统化的质性编码。为规避主观偏差并夯实数据基础,研究在首轮编码完结两周后,盲选 20% 的样本子集进行独立性复编。随后,引入 Cohen's Kappa 统计量对编码者间的一致性进行量化裁决。实证数据显示,最终 Kappa 系数定格于 0.85 ($P < 0.05$),这一数值不仅显著超越了内容分析法的信度阈值,更确证了编码体系的内部稳健性与结果的可信赖度,为后续的深层意义挖掘奠定了坚实的实证基石。

(二) 研究工具

1.工具选择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公共政策领域开始注重政策工具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逐步兴盛。迈克尔·豪利特(Michael Howlett)与 M. 拉米什(M.Ramesh)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中的介入程度,将政策工具分为 3 大类别,为强制性、混合型、自愿性。陈振明对国内外学者对政策工具概念进行梳理,将政策工具总结定义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方式和实现机制。而在教育政策方面,他认为强制性工具如义务教育制度、办学标准、教师资格认证等,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混合性工具如教育财政补贴、学费减免、助学贷款等,兼具政府引导和市场参与的特点;自愿性工具如教育捐赠、民办教育、社区教育等,以自愿参与为基础。由于对政策工具的分类依据的是政府在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中的介入程度,与本研究通过政策工具来探讨双减政策文本相符,同时相较于其他政策工具分类,豪利特与拉米什所提出的政策工具分类综合性较强,分类较细化、明确,有助于细致剖析我国双减政策文本。故以此框架进行编码来分析我国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工具的选用情况以及政策颁布的效力。

2.政策文本编码

本研究借助 NVivo12 和收集梳理 2018-2025 年间政府颁布的对基础教育“双减”改革产生重要影响的法律法规、实施意见、工作通知、指导纲要等政策文本,对筛选出的专项“双减”政策文本进行分类筛选,按照“政策编号—条款序号”进行编码,形成了基于政策工具的“双减”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编码表见表 1,其中一级工具为核心类型,二级工具为具体实施手段,两者形成宏观框架到微观措施的层级关系。并对政策文本中的具体条款内容采用政策工具分析方法,将其分别归入强制性工具、混合型工具、自愿性工具等不同政策工具类型,系统梳理出 2018-2025 年我国“双减”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工具选择偏好与使用特征,为后续深入分析“双减”政策工具的组合逻辑与实施效果奠定基础。

属性	具体分类
政策工具 (一级)	1 强制性 2 混合型 3 自愿性
政策工具 (二级)	1 禁令类, 2 审批管制类, 3 处罚惩戒类, 4 监管监测类, 5 宣传引导类, 6 资源支持类,
政策发布份	2018-2025
双减目标	1 作业减负和培训规范, 2 教育生态优化, 3 学生全面发展与家长负担缓解

表 1

四、政策选择与分析

(一) 政策文本选择

本文以 2018-2025 年为时间区间,以“双减”“作业减负”“校外培训规范”为主题词,在教育部官网、中央人民政府网检索与双减相关的全国性政策文件。对于几经修订的政策,均选取 23 份政策最新版本作为分析文本,选用《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等核心政策的最新修订文本,构建本研究的政策文本分析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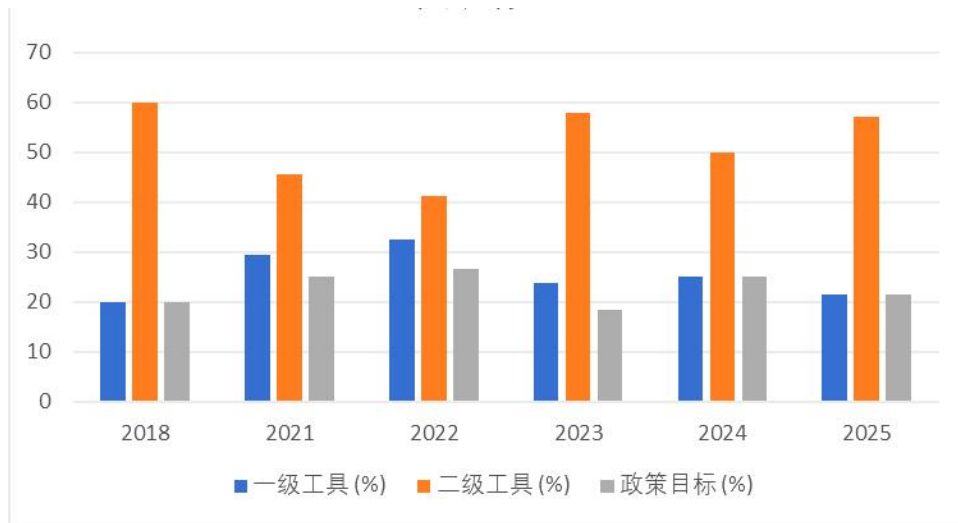


图 2

图 2 可以看出 2018 至 2025 年间政策工具配置的动态演进轨迹，各类工具的年度分布并非线性增长，而是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震荡特征。

一级工具的配置权重经历了从 2018 年的 20% 起步，攀升至 2022 年的峰值 32.4%，随后回调至 2025 年的 21.4% 的过程，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倒 U 型”发展曲线。可以看出政策重心在中期（2022 年前后）显著向强干预与刚性规制倾斜，试图通过高强度的行政手段破局，而后期的占比回落，则暗示了治理逻辑正从单一的“高压管控”向多元协同或长效机制过渡，标志着政策工具组合进入了优化重塑期。

二级工具在整个观测期内稳居政策工具重要地位，其配置比重长期高位运行。从 2018 年的 60% 起始，即便在干预强度最大的阶段也未显著偏离，并于 2023 年（57.9%）与 2025 年（57.1%）再度稳步回升。这一持续性的主导态势深刻揭示了混合型与倡导型工具在政策生态中的核心地位，它们不仅是政策落地初期的润滑剂，更在政策深化期（2023 年后）演变为驱动治理转型的关键引擎。图 2 占比的逆势反弹并非偶然，而是标志着治理逻辑发生了深层范式转移，即从依赖行政命令的“单向管控”，加速转向依托价值认同与利益诱导的“软性治理”，通过强化引导机制与激励杠杆，政策制定者正致力于激活社会主体的内生动力，构建起一种可持续的协同治理新格局。

政策目标维度在时序演进中呈现出显著的

“结构稳态”特征，其权重被严格规制于 20% 至 26.5% 的窄幅阈值区间内（2022 年达峰值 26.5%）。这种数值上的稳定发展深刻折射出政策制定主体的战略定力，即便在执行工具组合发生剧烈结构性震荡的情境下，核心目标始终发挥着基础性锚定功能，有效规避了治理行动的路径偏离，确保了政策体系的价值连贯性与目标导向性。

纵观观察期，政策工具结构呈现出“二级工具主导、一级工具协同、目标维度稳态伴随”的演化图景。2021 至 2023 年间“一级工具缓慢收缩”与“二级工具显著扩张”形成的结构性消长，绝非简单的数量互补，而是深刻映射了治理逻辑从“柔性倡导”向“刚性规制”的范式转型；而 2024 至 2025 年二级工具权重的逆势回升，则标志着政策组合正由单一规制路径向“混合型治理”架构复归，彰显了政策系统在动态环境下的自适应调适机制。

（二）政策工具使用的组合形式

1. 现有数据分析结果

基于图 3 对 2018 - 2025 年政策工具频次的时序追踪，可识别出三重关键演化逻辑：首先，在时间维度上，政策供给呈现显著的“脉冲式”非均衡分布，于 2021 年 2 月频次仅为 3 后，于 2023 年 3 月激增至峰值频次达 13 个，这种剧烈的振幅揭示了政策实施并非线性推进，而是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爆发特征；其次，在结构维度上，二级工

具以均值 3.3 的绝对优势主导政策组合，显著高于一级工具 1.8 与目标维度 1.5，折射出治理重心向“具体操作与执行层面”的深度倾斜；最后，

从演进态势审视，2021 年后工具频次虽呈震荡格局但整体趋势向上，有力佐证了政策干预力度在动态调整中持续强化的现实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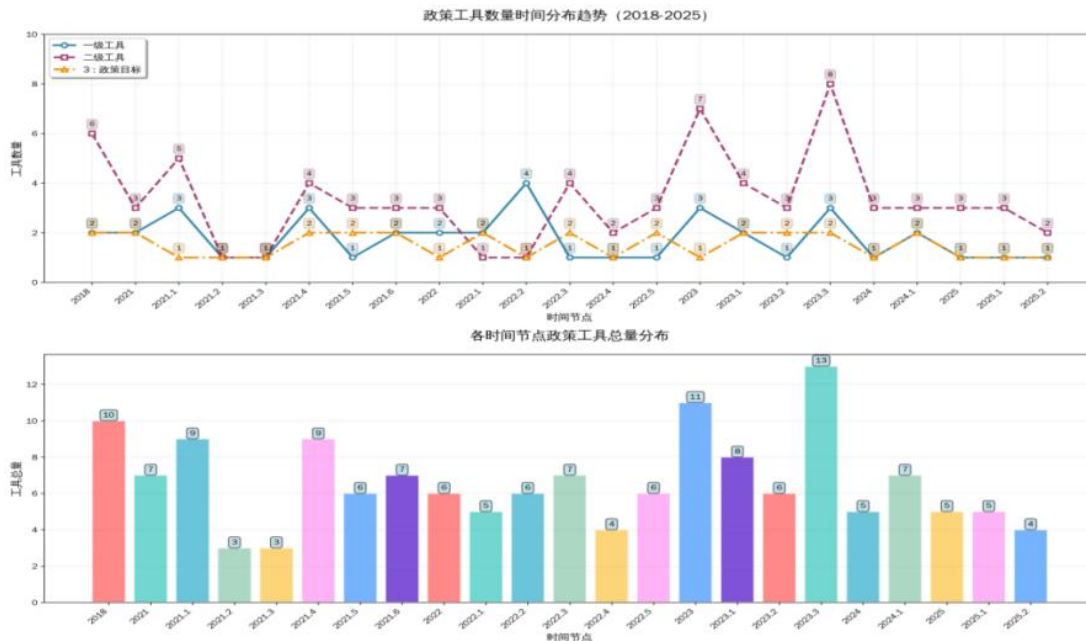


图 3

2. 政策工具的协同执行逻辑（按时间阶段划分）

结合“双减”政策 2021 年 7 月正式发布的节奏工具协同，呈现“目标先行，框架落地，措施补位，长效优化”的递进协同治理逻辑。

首先在铺垫期（2018 年-2021 年 5 月）主要是目标锚定与框架初探，当时政策目标稳定在 1-2，说明“减轻学生负担”的核心方向已明确；但一级工具、二级工具使用频率较少且波动小，可以明显看出政府在政策执行初始处于试点状态，通过较强的规制安排进行试探性推进，来评估社会的可接受程度，但也明确了核心目标，进行初步探索政策框架一级工具使用，仅配套少量具体措施二级工具使用，进而避免工具冗余，聚焦“目标统一”。

其次是启动期（2021 年 5 月-2022 年 2 月）。基于试点积淀的成熟经验，该阶段重心转向框架落地与措施跟进。伴随 2021 年 7 月“双减”政策颁布，一、二级工具频次同步跃升（分别达 3-4 个与 4 个），构建起“一级引领、二级配套”的协同机制，即以一级工具确立“强制、能力建设、系统变革”的核心架构，二级工具精准填充“规范收费”、“课后服务”等基础措施，实现了从“框架搭台”到“措施起步”的实质性跨越。

然后是深化期（2022 年 2 月-2023 年 3 月）政府着重多类措施并行与工具组合发力。一种政

策工具只有在以政策工具特征为一方，以政策环境、目标和目标受众为另一方之间相匹配的时候，才是有效的。该阶段的显著标志是政策工具总量的脉冲式上扬，截至 2023 年 3 月，工具频次触及 13 个的峰值。其结构性特征尤为关键二级工具激增至 8 个，而一级工具恒定维持在 3 个，这种“一稳多增”的态势深刻折射出政策执行从“框架搭建”向“细则填充”的纵深演进。此阶段的核心逻辑在于构建“同框多措、功能互补”的协同生态，以强制工具为例，通过叠加“违规查处细则”与“线上监管”等二级举措，极大地增强了“堵”的刚性约束；进而推动三类工具密集落地，构筑起集“刚性封堵、柔性疏导、正向引导”于一体的闭环治理体系。

最终步入稳定期（2023 年 3 月至今），政策治理模式由“高频出台”转向“优化调整”与长效运行。该阶段的显著表征是工具总量在高位回稳后呈现回调倾向，一、二级工具的频次波动显著收敛，标志着政策供给从“规模扩张”迈向“结构精修”。政府的协同逻辑随之更迭为“工具组合的动态调适”。这种“做减法”与“做加法”的辩证统一，重塑了“强制托底、能力赋能、系统引导”的三维协同格局，从而确立了政策可持续发展的长效运行机制。

3. 探究动因与逻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工具”

首先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政府作为强制性政策变迁的主体，掌握着政策制定、政策变迁的主导权，在执行中大量使用权威工具，表明国家以强大行政力量强力扭转教育生态的决心；其次是系统治理与源头治理。工具组合不仅“堵”去整治校外，更注重“疏”来提升校内，说明政府认识到问题根源在于教育评价体系和教育资源不均衡，试图进行系统性破解；再次是渐进式改革逻辑。从工具演变可以看出，政策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从宣传引导到强力整治，再到制度建设，体现了中国政策过程的典型特征；最后回应社会关切。工具选择强烈回应了民众对“教育内卷”和“生育成本”的焦虑，具有鲜明的民意基础。

五、政策工具视角下“双减”政策的实施问题与现存短板

（一）偏重强制性工具，社会协同参与不足

结合表2数据，一级工具以强制性为主占比峰值达32.4%，而自愿性工具占比不足10%，两者占比差距显著。当前双减政策以强制性工具为主，而自愿性工具使用处于边缘化。而在双减政策中主要体现为政府通过禁令类、审批管制类、处罚惩戒类等工具，以行政强制手段要求学校、校外培训机构等目标群体严格履行作业管控、培训规范等行为要求，并依托教育监管部门实施常态化监督管理，确保目标群体被动服从政策规制。但是，如果强制性政策工具使用过多，则使其“允许政府做职能范围内的任何事情”，变成“缺乏灵活性，不允许随机应变，导致决定和结果与政策目标相左”，而自愿性工具则强调政府弱化直接干预，依托家校协同、社会公益力量参与等自愿互动模式，整合社会资源助力双减目标实现。而科学的教育政策执行需要构建多元协同的执行体系，明确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家庭等主体的执行职责，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协同、分工明确、责任共担”的执行格局。但当前双减政策对强制性工具的过度依赖，虽能快速推动政策落地、提升管控效率，但也存在明显弊端，主要在于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对政府、市场、社会等方面多元治理格局的考量不足，对自愿性工具的设计与推广缺乏系统性规划，未形成家校社协同的有效机制，无法充分整合社会优质教育资源，难以真正实现“减负提质”的人本化目标。

（二）多种政策工具并用，组合形式固化单一

任何政策工具都内有着特定的功能属性与适用边界，单一维度的工具供给显然无法破解“双减”这一复杂的系统性治理难题。理想的政策执行逻辑，应当是基于问题情境的精准匹配，通过多元工具的耦合互补来形成治理合力。然而，对“双减”政策文本的深层剖析显示，尽管现有体系已完整覆盖豪利特与拉米什分类框架下的强制性、混合性及自愿性三类工具，且逾半数条款采用了组合策略，但其组合形态却陷入了严重的“路径依赖”与同质化困境。图2的数据直观地揭示了这种结构性失衡——此类固化组合的占比高达60%以上，构成了政策执行的绝对主流；相比之下，那些更能激发内生动力的多元化组合，如“资源支持”与“自愿参与”的协同、“处罚惩戒”与“正向激励”的配套，其出现频率不足15%，处于明显的边缘地位。这种“重管控、轻赋能”的单一化组合模式，不仅难以适配政策落地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差异化需求与复杂场景的动态演变，更在实质上抑制了学校、家庭及社会机构的主动参与意愿。

（三）宣传引导为主，正向激励工具供给不足

在“双减”政策工具使用中，混合型维度的“宣传引导”工具占据高位，成为政策传导的核心载体。该工具试图通过政策解读、理念浸润及典型示范等手段，达成价值共识与认知同化，进而规训学校、家庭及培训机构的行为范式。但又因宣传引导本质上属于一种“弱约束”的认知干预机制，其效能的充分释放，高度依赖于“外部刚性约束”与“内部内生动力”的双重耦合。审视当前政策实践，发现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政策执行过度倚重强制性工具的外源性压力，以行政命令倒逼目标群体对宣传倡导内容的被动服从。这种“高压驱动”模式虽能在短期内换取形式上的合规，却因缺乏实质性的利益联结，导致了“认知-行为”的深层断裂。相比之下，在教育方面应灵活运用补贴、购买服务、特许经营等混合性工具，激发教育活力，但激励行为在制度设计中长期处于边缘化甚至缺位状态。这种激励机制的制度性匮乏，直接削弱了宣传引导工具的落地根基，结果则会导致宣传引导沦为单向度的观念灌输，既无法有效激活学校提升服务质量的主动性，也难以促成家校协同的内生自觉，最终致使政策执行陷入“短期攻坚有效、长效治理乏力”的困境。

（四）侧重短期攻坚，长效保障体系薄弱

在“双减”政策工具的体系中，混合型维度的“资源支持”与直接性保障工具呈现显著的“结构性缺位”。前者涵盖财政补贴、师资赋能及物质兜底，后者指向公益托管、资源共享等公共服务的直接供给。二者本应构成政策长效推进的物质基石与核心引擎，却在实践场域中沦为边缘化配角。这种供给侧的制度性匮乏，直接导致“双减”改革陷入“无米之炊”的资源困境，难以维系政策深化的持久动能。更深层的病灶在于政策目标的“短视化”倾向，现有条款过度聚焦作业压减、机构关停等短期攻坚指标，却对经费投入的精细化治理、跨部门资源的协同配置及资金使用的规范性监管关注寥寥。这种“重破局、轻立制”的路径依赖，不仅诱发了资源配置的碎片化低效与补贴资金的跑冒滴漏，更致使教师专业进阶、课后服务质效评估、家校协同机制构建等长效议题被系统性遮蔽。虽能凭借行政高压在短期内迅速回应社会焦虑、破解显性顽疾，却因缺乏可持续的资源输血与制度造血功能，难以支撑“双减”改革从“物理减负”向“化学提质”的深层跃迁，最终掣肘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长远图景。

六、结论

（一）政策工具选择的演进特征与核心逻辑

政策文本分析目的在于以政策问题为导向，通过精准化、规范化测量政策文献内容若干重要特征，从而发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关于政策工具选择规律与政策内容侧重。本研究通过对2018至2025年间我国“双减”政策文本的编码分析，勾勒出政策工具的动态演化轨迹。在类型学分布上，“双减”工具箱呈现出显著的“非对称”结构：以强制性工具为“刚性底座”，混合型工具为“柔性中枢”，自愿性工具仅作“边缘补充”。二级工具（如宣传引导、资源支持）以均值3.3的高频态势压倒性超越一级工具（1.8）及政策目标（1.5），折射出政策执行重心从“宏观愿景”向“微观操作”的剧烈下沉。

时序演化维度揭示了清晰的“四阶段”跃迁路径：从2018年至2021年5月的“目标锚定与框架初探”铺垫期，跨越至2021年5月至2022年2月的“框架落地与措施跟进”启动期，继而进入2022年2月至2023年3月的“组合发力与闭环构建”深化期，最终迈向2023年3月后的“动态优化与长效运行”稳定期。工具频次在2023年3月触及13个频率点的峰值，标志着政策干预强

度与精细度的历史高位，其阶段性特征鲜明如刻。

究其深层治理逻辑，政策工具的组合并非随机堆砌，而是遵循三重辩证法则：其一，“国家意志的强制性变迁”，借由禁令与审批管制的雷霆手段，强行扭转教育生态的失衡惯性，彰显顶层设计的决断力；其二，“系统治理的堵疏博弈”，在高压整治校外培训乱象的同时，依托资源注入与价值引导等混合工具夯实校内主阵地，试图破解“内卷化”的根源性死结；其三，“渐进式改革的动态适配”，从试点探路到密集施策，再到反馈迭代，工具组合随执行情境灵活调适，既追求“短期破局”的速效性，又兼顾“长期引导”的可持续性，以此回应社会对教育公平重构与生育成本减负的深层焦虑。

（二）政策工具优化的路径建议

从实践层面来说，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承担着不同的作用效果。在一项政策中综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政策执行的效果会相当理想。而教育政策作为一种行政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意志的方向和主导教育改革与发展力度的大小。为此，各级政府在使用政策工具时，要综合掌握各项政策工具的优劣，围绕政策目标进行合理配置，在最大程度上形成政策合力，保证政策执行效果，需结合政策工具演进规律与组合逻辑，提出一系列优化建议：第一，优化工具结构配比，适度降低重复性强制性工具的使用强度，丰富自愿性工具的应用形式，构建“强制性工具定底线、混合型工具提效能、自愿性工具促协同”的多元工具体系，强化家校社协同治理；第二，创新工具组合模式，突破单一化组合局限，推动“资源支持加自愿参与”和“处罚惩戒加正向激励”等跨类型工具协同，提升工具组合与不同教育场景的适配性；第三，强化长效激励机制，增加诱因工具的供给与使用，通过财政补贴、职称倾斜、表彰奖励等措施，激发学校提升课后服务质量、教师优化作业设计、家长参与家校协同的积极性；第四，完善长效保障体系，加大资源支持工具的投入力度，细化财政资金管理、师资培训、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等配套措施，同时强化对教师发展、服务评估、机制建设等长效议题的政策覆盖，为“双减”政策长期深化提供坚实支撑。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虽系统解构了“双减”政策工具的演进图谱与组合逻辑，但仍受限于两重内生边界：

一是“文本—实践”的实证断裂，即研究止步于规范层面的应然推演，缺乏对执行现场实然效能的量化确证，难以精准捕捉政策落地过程中的衰减或异化；二是“空间异质性”的视角缺位，分析框架隐含了区域同质化预设，未充分剥离不同资源禀赋与发展能级对工具适配性的结构性制约。鉴于此，未来学理探索将聚焦三重纵深拓展：首先，打破文本中心主义，引入混合研究范式，通过大样本数据与深描案例的互证，揭示政策文本逻辑与基层实践逻辑的张力与错位；其次，植入空间比较视角，审视不同经济梯度下工具选择的差异化图景，为破解“一刀切”困境、推动政策的在地化优化提供实证支撑；最后，拓宽全球治理视野，开展国际教育减负政策的跨国范式互鉴，在汲取他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工具箱，为“双减”改革的长效迭代提供更宏阔的理论坐标与实践路向。

参考文献

-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2]刘叶婷.迈克尔·豪利特、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J].公共管理评论,2008,(00):140-144.
- [3]张国庆.公共政策分析[M].MPA公共管理硕士系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 [4]孙锦涛.教育政策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5]范晓东,杨钰钰,刘一丹.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双减”政策的文本分析[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22,28(5):14-22.
- [6]陈学飞.本土化·理论化·经验化——评《中国教育政策过程本土化研究》[J].大学教育科学,2017,(03):2.
- [7]谢晓琴,江敏.政策工具视角下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政策试点的扎根分析——基于我国60个试点城市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21(6):98-104.
- [8]陈振明,张敏.国内政策工具研究新进展:1998—2016[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06):109-116.
- [9]孙科技.教育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政策工具应用偏差及其矫正——基于省级政策实施方案的文本分析[J].教育与经济,2019(3):3-10.
- [10]杨代福.政策工具选择的视角、研究途径与模型建构[J].行政论坛,2009,16(03):21-26.
- [11]赵垣可.政策工具视角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文本计量研究——基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以来的政策文本分析[J].上海教育科研,2020,(05):5-9.
- [12]张茂聪,吕晓敏,杜文静.校外培训治理的政策工具选择及其优化——基于20个省级“双减”政策文本的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3,44(03):24-33.吕志奎.公共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执行研究的新视角[J].太平洋学报,2006,(05):7-16.
- [13]谢维和,陈超.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走向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教育政策数量变化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03):1-8.
- [1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21,(10):2-7.
- [15]Howlett M, Ramesh M. Studying Public Policy: Policy Cycles and Policy Subsystems[M].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6]Scott J. Documentary Research[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 [17]Neuendorf K A. The Content Analysis Guidebook[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2.
- [18]Salamon L M. The Tools of Government: A Guide to the New Governanc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